

十七世纪荷兰绘画发展的经济动因

潘 勇

在研究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时,我们有必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如果把艺术创作和经济基础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作为视觉产品的架上绘画,便是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的社会精神活动,17世纪荷兰架上绘画的高度繁荣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17世纪的荷兰逐渐发展为西方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随着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荷兰人将文化消费和商业投资定位在架上绘画上,预计的资本投入与商业利益的回报——这种因意识形态和新生经济运行规则引发的变化,进一步带动了大众文化消费。17世纪的荷兰架上绘画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现出极强的时代性和生命力。

一、意识形态与新生经济的主要特征

自16世纪起,荷兰逐渐步入了一种新型的经济社会。在加尔文教的影响下,勤俭工作的人开始将物质上的成就视为上帝的恩宠,过去社会上许多不被看好或者不被尊敬的职业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经济美德和伦理性第一次转化为具体的财富。

在这个蒸蒸日上的社会里,一切活动都讲究经济效益。富裕起来的荷兰人开始成为各类架上绘画的购买者。汉斯·弗雷克总结了这种情形,他说“荷兰人以商人的方式对待美术,他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只是为了从中获得更多。”(转引自艾思·罗宾逊《共享的价值:过去和现在——17世纪荷兰美术市场的启示》)在这样的情境下,绘画作品成为被广泛追逐的对象,收藏市场的需求大大增长,个人手中所掌控的架上绘画成为财富的象征,“到了1660年时,最小的店老板家里都有不少的画,每个房间都挂满了。就是农民也毫不吝惜,一次拿出二千盾或三千盾来买画”(保罗·祖姆托《伦勃朗时代的荷兰》)。

当时架上绘画的生产与营销都得益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系的发展。这个体系的建构,进一步提供了经济繁荣和高度精神文明所需要的能量,使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渴望改革的社会。这股力量反过来推动着社会前进,为架上绘画的发展

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二、商业投资与架上绘画发展的相互促进

市场条件的普遍性和社会性是架上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促进了架上绘画专业化层次的分离——肖像画、室内画、静物画和风景画,这些绘画形式记录了17世纪荷兰物质和精神的变化。

作为现实主义绘画的新品种,肖像画在照相技术产生以前的城市经济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能够在一个新教社会中延续存在下去的那些绘画分支当中,最重要的是肖像绘画”(同上)。肖像画基于其图式的记录功能备受推崇,荷兰人定制肖像画最根本的心理动机——无论是行业巨头、官员或普通市民,都是要通过肖像画这种媒介来确认各自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地位,职业、性别、家庭、婚姻状况等内容经过肖像的展示,使得自己在社会上取得认同,提升个人的价值。对画家而言,为他们绘制肖像画,则可以从中获得丰厚的收入。

弗朗斯·哈尔斯、伦勃朗·哈尔门斯·范·雷伊恩等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为肖像画高手。

作为特定人物特定时刻写真的肖像画在17世纪的荷兰为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人们对肖像画的青睐与购买照片的心理差不多,而且需求量很大,订件人与画家之间商业化的买卖关系的建立,主要取决于商品的劳务价格,商业化的运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肖像画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荷兰人对家庭的爱是全身心的,“家庭,是一家人的圣地,也是构成社会生活的中心。因此人们都愿意待在家里,津津有味地欣赏自己一尘不染的房间,闪闪发光的家具及器皿。”(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约翰内斯·维米尔、阿德里安·凡·奥斯塔德、扬·斯泰恩和彼得·德·霍赫等室内画高手都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琐碎的细节,勾勒朴素的生活图景。

维米尔的作品契合了荷兰人特有的家庭观念,概括了荷兰资产阶级的审美价值取向和消费经济特有的道德标准。奥斯塔德善于将幽默与诙谐的目光

转化为视觉语言的表达,引导我们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斯泰恩室内画的重要主题——家庭的喧闹,展示了荷兰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信仰和价值观所引起的欲望、苛求与伦理道德的冲突。霍赫则常常寻求在花园、砖墙和人物之间进行视觉的对话,画家不动声色的态度使伦理的话语注入了某种稳定的秩序和精益求精的力量。

通过室内画这一描述性的视觉艺术我们可以理解家庭在当时荷兰人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它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商业投资以及文化消费一整套行为获得了最终的平衡。

随着绘画需求的增长以及市场对作品的吸纳能力的提高,新的风格和表现手法不断出现。艺术家们精心制作“骗人眼睛”的工细的静物画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这类作品选取了水果、鲜花、银餐具、陶瓷器皿、纺织品等静物,揭示了餐桌的丰盛和经济富裕之间的渊源关系,反映了具有广泛基础的社会审美需求与消费趋势。静物画充满诗意的表现恰恰与荷兰人讲究舒适的餐桌生活完全相符。威廉·克拉斯·黑达的《吃剩的早餐》让人看到了精细的桌布上散落着牡蛎壳、大盘子和刀叉以及打翻的酒罐。而威廉·卡尔夫《有船蛸杯的静物》更是将自然主义的描绘发展到极致,画中选择船蛸杯、中国明代瓷器、带有图案的波斯织毯,有意识地证明当时荷兰的全球贸易和殖民地统治所取得的优势地位。画面使丰富的色彩和细微的光线变化获得了罕见的协调,呈现出几乎可以触摸的物质存在。这些视觉形式的变化尤其适合于我们对其突出的经济意义的理解。

荷兰人的艺术像一面自然的镜子,真实映照出 17 世纪这个国家的世间万象。雅各布·雷伊斯达尔等人的风景画凭借朴素的色彩、井井有条的布局把现实转换为更为精心的视觉图式。这种图式力图保持荷兰人所珍视的现实观念——物质的精神性。

美术市场的繁荣与发展一方面是单纯的经济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艺术家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构架起的美学品质,对于不同表现形式的架上绘画而言,人们获得它们既是审美需求和财富的象征,同时也反映出商业投资的心理趋向。

三、经济运行机制与架上绘画的商业化趋势

马克思说:“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

些特殊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卡尔·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论社会运行的模式如何,架上绘画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体现,必须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买和卖的活动在本质意义上是由它在市场上的成功与否决定的,正如当时荷兰市场上“画的行情也一路看涨。画市满足了兴趣爱好的不同、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需求”(马里特·威斯特曼《荷兰共和国艺术(1585—1718)》)。它作为社会经济繁荣的信息指标,不仅具有生活的意义,而且成为整个社会的重要支柱和经济杠杆,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表征了荷兰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时体现出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精神。

所有这一切证明,经济运行机制在相互期待的社会规范中进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社会体制性的结构。因此,“把文艺、审美的感受的表达与社会、历史结合起来……一切意识形态,包括文艺,都归因于经济基础,这是一个简捷明了的公式”(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荷兰画家的创作意识正是这一社会经验的结晶,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面对发展中的现实,在现实与真实的关系上,对荷兰生活加以真实描绘,确定以商人、富裕市民为中心的欣赏者的地位。由此可见,在画家所加工的意识形态的视觉产品中,集中地表现了它的社会内涵,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这也决定了在一个极其开放的市场里,商业利益是绘画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它决定了架上绘画的商业化进程。

17 世纪荷兰架上绘画作为视觉产品,总是试图在艺术家的个人才智和社会消费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系统地阐述某种理想图式,并遵照这个模式去考察社会需要的多重性,使审美功能成为艺术的动力,体现了市民资本主义发达城市的经济活力与架上绘画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样,架上绘画成为促进美术市场合法运转的力量源泉,这种意识形态的非凡成就使文化消费在生活中获得自我理解和消化。所以,只有把艺术家创作的视觉产品放到社会系统中加以探究,才能进一步理解由经济问题引发的艺术市场的繁荣。

(作者单位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